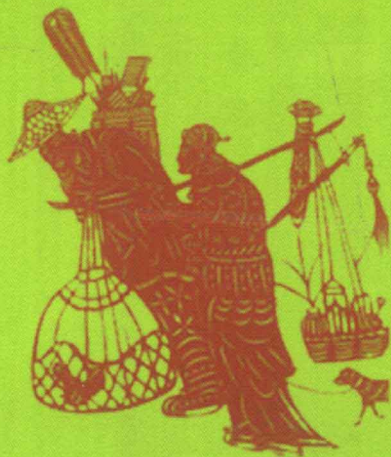




西北民族论丛

第二辑

周伟洲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论丛

第二辑

周伟洲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民族论丛·第二辑/周伟洲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04-4291-2

I. 西… II. 周… III. 少数民族—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IV. K2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907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苏 醒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北民族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 伟 洲

编辑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勇	王 欣	尹伟先	厉 声
吕建福	刘 戈	余太山	杨圣敏
张 云	李大龙	李范文	李 琪
罗 丰	苗普生	周伟洲	高永久
樊明方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

前 言

《西北民族论丛》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每年出版一辑。《论丛》是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重点是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因此,西北民族研究,虽然仅是对西北地域的各个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但其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且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尤为重大。

《论丛》面向国内外(包括港台),广集有关西北民族研究的论文及民族调查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广纳百川,尽量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论丛》还将收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面向国内外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论文;采用匿名审稿制度;以学术创新和水平作为择稿的主要标准;不囿于一家之言,提倡平等争鸣,以达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推动西北民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的目的。

总之,《论丛》的宗旨是:繁荣学术,服务现实;形式多样,不断创新。我们期待国内外广大学者、读者关心和支持《论丛》,并不断

惠赠佳作,共同将《论丛》办好,使之能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西部大开发的现实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所有支持《论丛》出版的单位和个人,没有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论丛》是难以如期出版的。

周伟洲

2002年2月

目 录

20 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郝时远(1)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认知和阐述系统	余太山(43)
常惠综论	王 欣(48)
隋唐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周伟洲(68)
唐西州的突厥游奕部落	李 方(88)
羌浑并为西夏主体民族考	吕建福(105)
回鹘文契约研究札记之一	刘 戈(137)
应绍不万户的变迁	宝音德力根(149)
从贡狮看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张文德(170)
清王朝对西北藩属哈萨克治理政策研究	厉 声(185)
1913 年中俄《声明文件》之签订	樊明方(214)
20 世纪汉唐都护府研究述评	李大龙(245)
马长寿教授对藏学研究的贡献	李绍明 石 硕(264)

附录:

第二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284)
西北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亚文化 研究会第三届年会闭幕词	(286)
西北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亚文化 研究协会第三届年会召开	(290)

20 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郝时远

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现代人类社会的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及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其中，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也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而消长，形成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的三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从一定意义上说，20 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形势的三次重大变化也是促使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后，无论是国际社会致力于构建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还是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前景的希冀，都无法回避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包括与此交织互渗的种族、宗教问题）及其所引起的矛盾、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也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在新世纪开端之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及其由此引发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阿富汗战争，20 世纪 90 年代初已纳入“和平解决框架”的巴以冲突再次陷入无休止的“冤冤相报”等重大事件，使民族问题在全球性问题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而为国际社会所高度重视，世界民族问题形势的走向也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对中国来说，世界民族问题形势的演变将产生哪些影响无疑也是政界、学界和社会范围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 全面释放：20 世纪的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民族现象是人类社会群体形式演变与国家形成过程互动的产物。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习俗、信仰、聚居地区和国家归属等方面的不同，结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民族关系。在漫长的阶级社会进程中，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不仅无法摆脱阶级社会的制约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及其所造成的历史纠葛往往成为影响现实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表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这类问题，被统称为民族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由于各大陆之间相对隔绝，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主要发生在古代国家内部，在欧亚大陆也发生在大陆性帝国扩张而造成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但是总体上说是非全球性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大陆之间的交往由于西方人的全球性侵袭，不仅造成很多古老的传统文明的衰落、甚至灭绝，而且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种族冲突。这些冲突，不仅表现为殖民主义统治势力与殖民地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更多地表现为殖民统治势力利用被统治人民内部的民族、宗教等差异和矛盾实行“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所造成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后，仍旧作为“历史遗产”留给了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此，我们在观察当代世界民族问题时，必须要有历史眼光。现实社会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却始终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于现实。所以，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民族问题形势的演变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进行分析，也需要从 20 世纪百年历史中去寻求动因和规律。

19 世纪末，世界已经被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

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仅英、法、德、比、葡、荷、意七国在世界上拥有的殖民地就达 115 个之多，被统治的殖民地人口达到 5.3 亿。这七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是本土面积的 29 倍，统治的殖民地人口是它们本土人口的 2.5 倍。尽管如此，世界瓜分者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体系，殖民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冲突，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同传统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这一体系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这一矛盾体系的各种冲突中不仅包含了民族矛盾，而且也突出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聚集使 20 世纪的前叶表现出国际矛盾、族际矛盾、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性。这三种相互交织、相互促发的矛盾，导致了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老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战争，其结果是奥斯曼、奥匈和沙俄传统帝国的解体和德意志帝国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古代历史中以欧亚大陆为代表的大陆性帝国扩张和统治的历史基本结束。而导致这些帝国解体和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①。虽然民族主义是近代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一种与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伴相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历史上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原始形态。1848 年的欧洲爆发了近代以来的第三次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被称为“民族之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欧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现代民族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 页。

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模式的出现，也使中东欧地区那些处于奥匈、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众多民族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式微和退缩，使奥匈、沙俄、德意志乃至法国、英国等新老帝国主义纷纷介入这一地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帝国势力较量的斗争中，传统的大陆性帝国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这些前帝国领土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却使中东欧地区出现了十多个以西方民族主义理念建立的独立国家，如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在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同时，以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则鼓舞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构成了 20 世纪第一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帝国解体——民族主义运动高涨——国家数量的增多这一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规律也由此初现端倪。

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以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传统的沙俄帝国也随之解体，在前沙俄帝国的版图上出现了近 70 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新生苏维埃政权在进行国内战争过程中，如何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列宁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政治胆识和从俄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实际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他强调指出，民族自决权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自决权，这是同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族自决权完全不同的。它体现的鲜明阶级性和彻底革命性，是通过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自决来推翻沙俄帝国统治为目标的。众所周知，列宁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是反对联邦制的。但是，通过十月革命的实践，他意识到在这个民族压迫灾难深重、分崩离析的帝国废墟上建立统一的国家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样一种国情出发，列宁在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和倡导各民族无产阶级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从理论上反对联邦制转变为实践中实行联邦制的建国思想。列宁认为从俄国的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出发,实行联邦制是向实现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前进一步”的必要阶段。列宁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离自由所赋予的革命内涵,他辩证地指出: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独立建国的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①。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列宁在建国模式上选择了联邦制,作为“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②。应该说,从理论上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在沙俄帝国废墟上建立苏联的国情实际的。所以,苏联的建立也为人类社会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列宁有关殖民地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对东方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关注,不仅推动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且也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呈现了合流之势。所以,从 30 年代以后,世界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相继呈现高涨的态势,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正在形成。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势力面临着殖民地人民日益激烈的挑战,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也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迅猛发展和自身的经济危机而惶惶不可终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也相继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因分赃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3 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第 816 页。

不均（英法盟国未兑现战后利益的承诺）而愤愤不平；德国因战败、赔偿和丧失全部海外殖民地而不堪忍受。宣泄这种帝国意识的民众政治动员则是依托于所谓“历史辉煌”、“纯净血统”、“优秀种族”和谋求“生存空间”的极端民族主义。而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在吸收和融会了历史上各种非理性的、偏激的思潮后，便形成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最终导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一场灾难。在这场浩劫中，法西斯主义实行的种族屠杀、民族征服、领土扩张政策使资本主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仇恨，消灭法西斯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对种族主义的无上推崇和残酷实践，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其他国家历史上“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优越等观念，并在实践中削弱了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构建的全球性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在民族自决和战后联合国推动的“非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运动形成全球性的浪潮，也就是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40年代，亚洲、欧洲地区有14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50年代，亚洲、非洲等地有11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60年代，非洲等地有45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其中被称为“非洲年”的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实现了独立；70年代，非洲、大洋洲等地有25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80年代，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地有9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①；

^① 根据王春良、翟云端主编《当代民族独立运动通览》附录统计，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732—765页。

其余波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1990 年纳米比亚宣布独立，结束了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1994 年贝劳宣布独立，联合国的委任托管宣告结束；1997 年 7 月香港回归和 1999 年底澳门回归祖国，彻底结束了亚洲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虽然由于印度尼西亚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对东帝汶的侵略和占领使这个前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迟滞了 24 年，但毕竟东帝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实现了独立。在 20 世纪结束之际，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总体上已经结束。当然，现存的极少数前殖民主义帝国所属的“海外省”或“海外领地”仍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法国的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的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仍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西方殖民主义构建的海外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民族国家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 1945 年 8 月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实现独立，到 1990 年原德属殖民地后为南非托管地的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使联合国成员国增加了 100 多个。

与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不同的是，在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运动中，无产阶级运动也进入了高涨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更加广泛。因此，战后不仅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也使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独立建国运动增加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取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影响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一些谋求独立建国的政治力量在其民族主义政治纲领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如印度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社会主义、缅甸纲领党的社会主义、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加纳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几内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坦桑尼亚尼雷尔的社会主义、赞比亚卡翁达的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的社会主义

义、马里凯塔的社会主义、塞内加尔桑戈尔的社会主义、刚果劳动党的社会主义、贝宁人民革命党的社会主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的社会主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社会主义、埃及纳赛尔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本·贝拉和布迈丁的社会主义、利比亚卡扎菲的社会主义、智利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圭亚那贾根和伯纳姆的社会主义，等等。与此同时，由于东西方冷战对抗格局的形成，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造成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分裂状态。如南北越南、东西德国、南北朝鲜，以及当美国介入中国的台湾海峡事务后制造“两个中国”所形成的中国海峡两岸分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摆脱了法西斯主义的噩梦后重新回到了同社会主义对抗的现实中，它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视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必予遏制，因此 20 世纪的世界在经历了两场“热战”之后又进入了冷战时期。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这种建立在政治信仰、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对抗，使世界很快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并最终表现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竞争。美国试图以西方的制度来统治全球，苏联力求用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世界，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化”统一。然而，这种最初表现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逐步演化为以核对抗为特征的霸权主义争夺，从而使它们重蹈了历史上帝国争霸的歧途。人们无法从美国的霸权中感受到所谓西方民主、平等、自由带来的福祉，人们也难以从苏联的霸权中感受到所谓“苏式社会主义”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恩惠。这种霸权主义的争夺，不仅使整个世界处于以核威慑为特点的战云密布之中，而且压抑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通过发展解决民族问题

和所有社会问题的进程。

冷战期间，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在美国争霸的过程中，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一条盲目判断和激进推动自身社会发展进程从而导致简化处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道路，从而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现了向传统俄罗斯帝国回归的走向，形成了对内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和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体制。所以，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变实际上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发生了，这种演变就是逐步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点从苏联政府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实践中是最具代表性的。苏联的这种变化和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出现的重大错误，无疑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超前判断的盲目性和脱离实际的激进性直接相关。超前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导致对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简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正是这种简化的基本表现。这种状况在斯大林之后继续被承袭并进一步发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体制实践，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实际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极力推行“苏联模式”一体化的思想禁锢和体制控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预，其结果不仅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僵化和社会主义活力的丧失，而且最终导致自身的瓦解，并使一批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统一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这种弊端造成的恶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和干预都是为了消除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单一地得到解决，只能在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如果社会总问题解决不好，民族问题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然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并没有解决好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问题，在此基础上人为地判断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后果就是对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以致当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认为沙俄历史留给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时，西方势力却敏感地意识到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①。也正是因为这两种根本相悖的判断，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同苏联对抗、竞争的战略构思中也把“苏联国家的多民族特点”，列为造成苏联社会消极因素的首要条件，认为“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和多民族构成，为在苏联各族人民中宣扬批判现状的政治观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②，为此，美国对苏联实施“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攻势，“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上”^③。其目的就是利用苏联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积怨和现实不满，挑起非俄罗斯民族与俄罗斯人控制的联盟政权的“正面冲突”。因为“非俄罗斯人坚持任何重大的民族权利要求，都会对俄国的领土优势构成挑战”。而且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甚至大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也会最终到来”^④。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在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构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① 埃莱娜·卡·唐科斯基：《分崩离析的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页。

②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政治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6、216页。

③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④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政治纲领》，第117、226页。